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六四期 ——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703f)

---

【书 评】不可多得的红卫兵史料——《红卫兵兴衰录》	印红标
【读史感怀】燕来相识 触目菩提——《红卫兵兴衰录》读书笔记	师又林
【往事回首】《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 (节选一)	宋柏林著·余汝信编注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书 评】

不可多得的红卫兵史料——《红卫兵兴衰录》

• 印红标 •

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文化大革命作为一段历史，虽不算遥远，研究者却常常感到资料的缺乏。官方档案严格封存，散在民间的资料也未做系统的征集和整理，正在随着时光的消逝而流失。在这样的背景下，《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一书在香港出版，令研究者感到欣喜。这本书的内容是红卫兵首创者——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核心成员宋柏林的日记，记录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活动。最可称道得是，这部书保留了日记的历史原貌，未做加工或删节，从而具有回忆录及其他一些经过加工的日记（哪怕只是稍加删节）所无法企及的可信性和资料价值。治学严谨的文革史研究者余汝信为日记作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主要笔杆子骆小海作序，更使之增色。

#### 一、来自红卫兵运动的核心

《红卫兵兴衰录》的内容是处于红卫兵运动核心地位的宋柏林的日记，其史料意义首先是记录了红卫兵运动的一些重要活动。

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初，日记的主人宋柏林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中国第一支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核心成员之一、曾被推选为本校革命师生委员会成员。1966年8月18日，他与韩军、骆小海三人作为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面见毛泽东并简短交谈。第一批红卫兵（即“老红卫兵”）失意之后，日记的主人同情并参与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的一些活动，经历了老红卫兵由盛到衰的全部过程。这种来自运动漩涡的核心人物的完整日记是难得一见的。

这部日记的内容偏重于政治运动和思想活动，其风格既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模仿英雄人物，抄录豪言壮语的雷锋式革命日记，也不限于私人情感天地，而是一部如实地记录了文化大革命见闻、思想和作为，写给自己看的日记。其中所记红卫兵的活动、激情、困惑、苦恼以及读书心得，均无娇柔做作之词，而为亲见亲历的实录、真实情感的表白，反映了老红卫兵的政治兴衰及思潮起落。

这部日记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连贯性和完整性。日记的主人多年以来每日必写日记，多则多写，少则少写，从无间断。这对于常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在文革的动乱年月。《红卫兵兴衰录》一书收录了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发动至1968年2月日记主人当兵离开学校，近两年间的全部日记，无一遗漏，并且选登了1966年1月至4月的部分日记，作为文革前夕的背景铺垫。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呈现给读者的这部日记，未做删节，未经加工润色，保持了资料的原貌和完整性，甚至相关人士的姓名也原样照录，只对部分明显的错别字作了纠正。目前所见到的回忆录往往随时代和主人地位与思想的变迁，有意或者无意地出现选择性记忆，而目前发表的一些日记、笔记之类资料，往往由于原著者或编辑者的现实考虑而只选登部分内容、或作删节、乃至加工润色，从而使其史料价值打了折扣。

## 二、老红卫兵兴衰的忠实记录

这部日记从一个核心成员的角度，记录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兴衰，其中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名称和成立时间的记载，是以往红卫兵研究者所未见的新资料，也提出了新的问题。

日记从1966年5月25日以后就不断提到后来组成红卫兵的激进学生的活动，特别是对清华附中校领导“资产阶级教育方向”的批判。1966年6月3日的日记第一次谈到这些学生正式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机构，但是这个组织被称为“红卫士”而不是“红卫兵”。

这一天的日记写道：“中午我们‘红卫士’的一部分战士到圆明园去开会，正式建立起组织机构，订好了反攻计划。”

就笔者所知，以往的各种资料，不论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出版物还是文革后的回忆录，都没有出现过“红卫士”这个名称。骆小海在为这本日记所写的序言中，回应了“红卫士”的说法。红卫兵最初是不是被称作“红卫士”？这会成为当事人和学者回忆和考订的新问题。

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的日期也由于这部日记增加了新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期间，清华附中红卫兵称自己的组织成立于1966年5月29日，文革以后的回忆也多持这个说法。据宋柏林上述6月3日日记载，红卫兵应当成立于6月3日。综合骆小海为这本所写的序言及以往的几种说法，合乎情理的解释似乎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立有一个过程，5月29日决定统一署名为“红卫兵”，并统一行动，而正式建立组织机构是在6月3日。

日记中还有多处内容印证了回忆录提到的史实，特别是一些老红卫兵不为外人所知的思想活动。例如：1966年12月的日记反映了老红卫兵政治失意后的苦闷和徘徊。日记的主人看到歌颂红卫兵的文艺表演，“回想起‘8·18’前后的壮景，对比现在油然而触伤感。回家看到陈伯达、江青对北航‘红旗’的关门讲话，我又不禁想起‘8·6’在天桥剧场江青、康生等同志对我们关门讲话的情景，油然又生伤感。又看主席诗词，陈老总的解释，不禁落下泪来。”

日记对“联动”1966年12月26日大会上红卫兵的情绪也作了相当客观的记录：12月26日会议反映出目前中学老红卫兵的状况，“用脑子的人都对形势有较正确的了解，不反文革（指中央文革小组——引者注）。但绝大多数还是咽不下这口气，迫于形势，虽也不敢大反，但一有风吹草动，一声半呼，就都跃跃欲试，一呼百应。但大都是为出出气，真正傻瓜的很少，总之绝大多数仍在彷徨之中。”这次会议的组织者、策略派本来还寄一线希望于通过“破私立公”争取中央文革小组的谅解和支持，但是结果，被“咽不下这口气”的红卫兵，打乱了议程。对此，以前已有卜大华等人的回忆，现在在宋柏林日记中得到证实。

日记中诸多此类记载，为红卫兵运动和文革研究者，提供了考订和考察历史事实的重要资料依据。

### 三、家长的影响

《红卫兵兴衰录》这部书完整地保留了日记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得以了解影响红卫兵发展的不少有价值的细节。例如，红卫兵的活动与其担任领导干部的家长的关系，是当时人们猜疑很多，但缺少直接资料的问题。这部日记提供了可信的例证。

红卫兵是十几岁的中学生，以领导干部子女为核心，他们反对学校领导、挑战工作组权威的造反活动，是不是得到家长的支持或者指点？影响程度有多大？他们大字报里出现的某些只有党内领导干部知晓的内部信息，曾经令学校或者工作组领导吃惊。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曾经回忆说，他们与学校领导和工作组发生矛盾时，工作组曾动员家长劝阻学生，但是他们还是从私人渠道得到了不同的信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对他们的造反活动很是赞赏，而这些干部并非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这本日记记录了某些领导干部与红卫兵早期活动的关系，印证了人们的猜测和当事人的回忆。

文化大革命之初，日记的主人是高中三年级学生，他的父亲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身为高级领导干部的家长对儿子的政治倾向有着重要的影响，有时父母直接地给予支持或指点。

1966年5月下旬，激进学生与学校领导的矛盾日益尖锐，5月29日日记提到：“妈妈说我们没有错”。6月1日，红卫兵反对学校领导的活动发展到公开对峙。6月4日日记中写道：“爸爸很支持我们”。6月5日日记说：红卫兵“王铭找了孔原，熊钢找了薄一波，还找了许多其他的老干部，凡是找到的老干部，都坚决支持我们干革命”。这些日记，证实了外间关于红卫兵有高层背景的猜测。

工作组进校以后，红卫兵与工作组发生分歧，日记记录了家长对红卫兵的支持和忠告。红卫兵不同意工作组所强调的团结大多数学生的口号。6月23日的日记记录了父亲的谈话，表示在清华附中这样的学校，团结95%可能不太适当。6月下旬以后，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分歧在石油附中运动、“造反精神”的口号等问题上继续发展。从日记里可以看到父母赞许红卫兵在石油附中问题上的态度，对“造反精神”的口号之争，也表同情。

日记也记下了一些红卫兵学生的家长对子女的担心：在红卫兵张小宾家，“他妈妈和我们谈了许久，让我们好好学习主席著作，好好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切不可头脑发热被敌人利用。”（7月7日）

日记里出现了一些干部子女从家长那里获取内部消息的记录。7月11日日记说，清华附中红卫兵通过父辈的渠道，得知内部《工作通讯》十七期刊载了本校工作组关于红卫兵的负面报道。后来，红卫兵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引述了这期《工作通讯》的内容。

这些来自上层的小道消息使红卫兵有恃无恐，也使清华附中等学校工作组感到与这些有高干背景的红卫兵较量并非易事。

干部子女的家庭内部消息优先于中央正式传达渠道的又一个例证是，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首先通过干部子女传到红卫兵之中。8月2日日记记录“从矿院附中那得到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最热烈地支持我们的造反。”次日，王任重才代表中央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宣读了这封信。矿院附中的这个抄件，来源于该校学生杨冀平，杨冀平的父亲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

高级干部对红卫兵的态度，说明党内对于文化大革命认识不一，不少干部在运动开始时还抱着期待。这些领导干部既希望子女按照毛泽东的教导，在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迈出成长为“接班人”的第一步，又担心这些未谙世事的孩子在政治风浪中“被敌人利用”、跌跟头，因而以自己的经验给予指点，甚至支持，但是其结果往往出乎意料，其中的是非得失是应当正视并认真总结的。

谈到这些与重大社会政治活动有关，却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不能不对日记主人坦诚直面历史的勇气感到敬佩。大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并不是一贯正确的，很多人往往既是运动的参与者或者加害者，又是运动的受害者，只是加害和受害的时间不同、问题不同、程度不同。如今，红卫兵的作为早已为社会所批评、谴责，而要防止悲剧再度发生，必须分析历史事实。这部日记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病理标本。勇敢地把记录了自己思想和经历，包括明显错误和荒谬的日记，无保留地展示给世人，供人们分析评说，若无坦荡的胸襟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是做不到的。对此，历史学者怀着敬意。

### 三、独具匠心的编辑和注释

《红卫兵兴衰录》一书的编辑和注释，独具内行之匠心。

首先是编辑者余汝信先生坚持保留了日记的原貌，使之免于删节之憾。这一点前文已经谈过。宋柏林的日记是一份罕见的历史资料，正如作者《后记》中所说：“本人在运动中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没有成为‘专政’对象，没有被抄家，所以能够毫无顾忌地写出自己的真实思想并完整地保存下来，还有许多照片和文物，这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实属难得。”

其次，编辑者对日记做了详细且专业的注释，为读者释疑解惑。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旁人读起来不可避免地有费解之处。编辑者的注释为读者作了十分到位的解释。这需要对文化大革命背景知识的细致入微的掌握，也少不了对日记主人的细心询问。

例如：日记中写到与工作组的矛盾时，几次提到“张田丰”，如果不是编辑者指出，读者很难猜出这是隐语，指代工作组；“张”指清华附中工作组组长章建华、“田”和“丰”分别指成员小田和小封，如果按照字面将其当作一个人名，就不会理解这个“张田丰”的重要性。这是只

有日记主人才能说得清楚的问题。

编辑者对日记中出现的诸多人名、简称、外号、专用词语做了说明。例如清华附中预科班的设置与众不同，高631、高632、预641和预642同为高三年级，不知详情者常常为之疑惑，有了注释则一目了然。编辑者特别对日记主人来往较多的同学朋友的家庭背景、家长官职做了说明，这就可以使人很清楚地看到，日记主人的同学朋友圈子，主要是军队高级干部，多为少将和中将一级干部子女。这对于准确理解日记主人的社会环境，理解日记所反映的情况无疑是重要的。

编辑者的多处注释指出日记中的误传，表现了编辑者对史实的准确把握。例如，编辑者指出1966年6月19日日记中抄录的毛泽东语录和12月16日抄录的毛泽东诗词当中有一首是当时广泛传播的伪托和误传之作。类似事例还有编辑者指出1967年5月17日日记关于中央对内蒙运动的指示是失真的消息。从书中的大量注释，足见编辑者余汝信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独到的学术功力。

其三，《红卫兵兴衰录》请骆小海作序，也是成功之举。骆小海是清华附中最主要的发起者、负责人之一，与卜大华、邝桃生被并称为“卜骆邝”，又是主要的笔杆子，是《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等著名红卫兵大字报的执笔者。骆小海是红卫兵运动一系列重要事件的关键性知情人，这是他第一次如此详细地叙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历史，不仅对于理解这部日记十分必要，并且其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最后，书后附录的几篇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注明了版本出处，也是一般读者或研究者不容易见到的。

说到不足之处，本书保留了日记的原貌，仅对某些明显的错别字做了订正。就历史资料而论，如果编辑者能在订正之处逐一加以注释，会更加完满，更据可信性。

相信这样的一部不可多得的资料书，会赢得红卫兵及文革研究者的重视与肯定。

□ 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2007年2月号。

~~~~~

#### 【读史感怀】

燕来相识 触目菩提——《红卫兵兴衰录》 读书笔记

• 师又林 •

#### ◇ 日记出版前

知、交宋柏林四十年。文革初期，闻他红卫兵创始人之大名；从共同的朋友，日记中提到的，阳生、小静、亚黎、熊刚口中听到过他的逸事；及至他当兵、我插队，同在冀中平原某村落一亩三分地上，始面晤。鸡犬声相闻，一起度过“史无前例”的岁月。文革结束后，我们被大都市的繁忙和中美间的大海淹没，中断联络。八、九年前，恢复了“组织关系”，柏林兄寄来两封厚厚的信，是十三页从日记中摘录出来、手抄的、有关我的八十多条记录。感他义气的同时，方知老哥有几十年不间断地写日记的习惯。那大概也是写了多年日记之后，初次清仓查库，他在信中说：“（日记）从未仔细翻阅过，这次为了找你，细细读来，竟发现不少人和事是早以忘怀的。”“这是我个人心底的财富。”

当时心说，什么“财富”呀，不就是个流水帐么：“到（营房）墙外机井洗褥单，又遇到师又林用马耕地。这两天真是巧得很，原来他们十三队的地就在这周围。”

一九九八年，我的先生，历史学教授，黄开来承蒙柏林兄嫂款待游穗。聊天时，谈到李志绥医生回忆录中一事：一九六六年夏天，毛泽东秘密由南方返京，直接到大会堂主席台后。那里中共领导人云集，正进行文化革命报告会，刘少奇说自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站在幕后的毛泽东自言自语：“什么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我看是老反革命”。一会儿，他突然走到前台，意外现身，引起全场轰动。宋柏林遂从日记中翻出七月二十九日一页：“刘主席的讲话也和拉家常一样，太谦虚了。领袖们都是这样，一再表示要当小学生，向大家学习，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呼声未了，掌声骤起，毛主席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我毫无思想准备”。它佐证了李志绥的回忆所言不谬。听了先生的述说，始承认他老兄真不是吹牛，日记确实是储藏着文革典故的富矿。

前年秋天，分别二十年后，我们终于在广州重逢，并住宿柏林兄家。他引我至书房，打开书柜，几十本日记静静地排列。它们大小、式样不一。有些是各色塑料皮的，里面带有革命样板戏和《毛主席语录》的插页。有些白色的笔记本，写有“用毛泽东思想记日记”的字样。时间使它们的封面颜色暗淡、陈旧，内页纸张泛黄，有了古董的模样。“这些，你随便看吧。”柏林兄说，平常得仿佛不过是递上一杯白开水。

因为倒时差，我总是凌晨三、四点就醒，写字桌前，台灯相伴，翻看蒙尘的往事和日前写下的新鲜文字。那里有心灵的自言自语、思索的自问自答，也有工作、交友、婚恋和家常琐碎，比如今天买了什么书之类。它们并不都那么引人入胜，有些甚至说得上枯燥。然而，据考证，我是获此殊荣第一人，安敢轻易释手，负兄美意？于是，每天读到东方大亮。倚凉台远眺，九曲迂回的珠江水域河流披霞光漫步。当一人历经世事，仍能向你毫无保留地开放他的“自留地”时，那份坦荡也足够令人瞩目。

通观过柏林兄的全套四十本日记，最生动和富有趣味及史料价值的正是现在发表的《红卫兵兴衰录》那部份，可谓四十年日记之精华。我和先生一直认为他的日记埋在地下太可惜，应该开发出土。柏林兄曾经给过我这部份的复印件，嘱我捡其一、二放到网上投石问路。我生恐过早曝光，糟蹋了东西，久久“阳奉阴违”。听说余汝信君要为他出书，顿时大松口气，对日记颇有“赵云投刘备——得了明主”的感觉。

#### ◇ 言近旨远

历史研究讲究的是根据第一手史料，即根据历史事件发生和最接近的时间里产生的原始资料了解真相。属于文字类第一手史料的包括书信、手稿、期刊、报纸、讲演词和政府文件等等，日记也在其中。它使人们通过只在特定的时空中出现、后来绝不会再有、因此是独一无二的、充满感性的个人经历了解过去。

在那场“触及灵魂”的风暴中，人们真诚的写日记是一种危险的奢侈。文革研究中恐怕没有比日记这种第一手史料更难收集的了：写的少、在政治漩涡的中心写的更少、能留下来的再添一个少、愿一字不改又值得发表的越是少上加少。准备这篇书评时，我查阅了专门发表文革研究作品的《华夏文摘增刊》。围绕纪念文革四十周年前后、四月到九月的一百多篇文章中，除有关柏林兄的日记外，发表和介绍日记的只有两篇：姚文元日记摘录和何蜀先生评陈奂仁的《红卫兵日记》，指出其“不应有的整理”。如此看，宋柏林的日记当属稀有之列。物稀为贵。

浏览那些文章，还给人一种印象：揭露评论大案要案的多，揣摩推测高层权力斗争的多，洋洋洒洒阐述宏观理论的多，断断续续对个人或团体某时某刻的具体遭遇回忆多。大家无不有的放矢，有指而言。柏林兄自然地随意地录制了从内心到行动，从京城到僻壤，从人文到地理，从高干及子弟群体到下层工农百姓的文革社会风貌大景。比如，他描述了串连时怎样扒车、混车，声称“红卫兵成了抢车司令”；写了用橡皮、小刀刻图章假造介绍信；生产队长多下两斤米招待他们和工厂基本不开工的情况等等，具体、生动、真实、浑然天成。这不仅对后人摆列文革拼图是难得的一盒彩片，如果静下心来读，即使对过来人，仍会收获不少新认识。看到他日记中：“今天最有趣的见闻要算工人和农民发生矛盾了……这些投机倒把的农民如此老实巴交的，那么那些安分守己的是何等朴实而可爱呀。不过，他们都是贫农，他们说只有贫农才能干这样的事。”一段，不禁感慨现实怎样撕碎了中学生心目中“工农联盟”、“阶级分析”的神话。我对柏林兄那段话更垂涎：“我们刚进南京路不过一百米就买了五、六项下肚的，一路上两人共花了一块多钱的零食。”一人五毛的零食就能吃一路，今人看来简直就是神话。

尽管如此，与研究文革的专家学者兴致勃勃相反，日记发行后，和我一样亲历早期红卫兵运动的朋友，包括柏林兄的旧识，都反应平平，不致多词。多数人和我最初的感觉相仿：这些事早都知道了，没什么新鲜的，有什么好评说的？

美国有句俗话：你的废物是他人的宝。同样的事，在当事人和后来人或局外人眼里会有完全不同的映象。披露自己熟知的事，常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刚到美国不久，我曾在一养老院打工。某天，管理员伯娜黛叫我到她办公室，说：“这是你半年一次的工作评定表，我已经填好了。你看看，如果同意就签名吧。”我看差不多每项都是满分，就欣然签字。她一面把表收入文件夹，放进文件柜里，一面带着例行公事的语气说：“你的档案就在这里，任何时候你想看，都可以通过秘书取出来。”“什么？！”我惊叫。没等她答，就让她把文件夹重新拿出来给我，里面有我申请工作的表格、推荐人的信、获表扬的记录和工作评定。我并没仔细看，只翻来覆去地玩弄了几下，让她再放回去，再拿出来，再放回去。两个回合过后，轮到我对一脸惊讶的伯娜黛说明，中国文革时期，个人档案怎么被严格地控制，不仅当事人无权知道，而且几张小纸更可以支配人的命运到无法预料的地步。我现在是生平头回尝尝翻自己档案的滋味。她司空见惯的事、我习以为常的事给彼此带来明显的惊诧。我清楚地记得伯娜黛本来已经很大的眼睛睁得更大，似乎没有眼镜片挡着就要掉出来了。我也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心头一颤。美国的汽车、洋房、金发、碧眼都没有此时让我更体味到是在一个有着不同发展历史的国度了。无法捕捉到那一刻情感起伏的每个浪花，只肯定，我因此增加了一个品尝周围生活的味蕾。事后，伯娜黛说她有同感。

由上可见，在我们众人眼里平淡无奇的宋柏林日记，对另外的人，却可能打开一个未知的世界。何蜀先生不是在已经在书评中证实了？“而这一部日记，却使我对他们有了全新的了解。我惊异地发现，宋柏林这样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核心组成员，高干子弟的代表人物，他当时的许多思想感情，对社会的许多基认识，对“革命理想”的狂热追求，“自觉革命”的真诚努力，甚至对一些文艺作品的好恶，竟然都跟我这个当时平民出身的“黑五类”子弟出奇的一致！”。“也许，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的社会条件之一吧？”（何蜀：《一块极有研究价值的“文革活化石”——读〈红卫兵兴衰录〉有感》）

朋友中有人表示失望，认为日记缺少文学色彩；有人觉得尚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没有记录。其实所有的价值正通过这体现出来。宋柏林日记从手写到铅印，从笔记本到成书，他始终无心插柳。没有美丽的词藻、精心的构思，才说明那确实“不是我准备光荣牺牲后给别人看的”（作者《后记》，下同）；没有事事都顾及和早有预谋的囤积，方显得“也不为有朝一日著书立说”；除个明显错别字，不删不改，才使日记成为名符其实“那个特殊岁月的原始一斑”，成为后人诠释当年可依赖的证据。

对于第一手史料的发掘整理，还有一些问题涉及其成色：这份资料本意是为发表或留为私人保存的？谁、为了什么目的发掘它？编纂者对此事有充分的知识吗？他是否有什么偏见、倾向性和隐藏着说服与通告的涵意？我想无论是当事人柏林兄还是对文革颇有探究、治史严谨的余汝信先生都经得起这几问。据知，清华附中一些同学，对如何评价那段历史有异议，酝酿进行讨论。宋柏林没去参加。他并不急于介入理论是非对错的争辩，正应了本人所说：“至于能够看到什么，是读者的事情，我像当年写日记一样，任它去了……”。

#### ◇ 那是来时路

无论故交旧友、“老兵”们，对柏林兄的日记有什么看法，怕都难以否认，读它如恍惚重走来时路。

美国出生的女儿上高中时，学了历史课回来说：“妈妈，我简直不能想象，你这么温和的人，怎能当过红卫兵？”我语咽，窘迫没有现成的答案回应这“简单”的提问，搪塞了几句连自己都不满意的话。柏林兄可以躲开类似尴尬。他只消把日记递给儿子看。

说来我是历史系毕业的，即使二十年没从事专业，也应该比一般人更懂得把亲身参加的文革做些整理的重要，却迟迟不曾动手。我爱对着电脑码字，对朋友谈天说地，却从没堆砌出关于文革的完整说道。也许是专业训练反而使我对拿捏不准的不敢轻易触动；也许是被一些来不来就上下五千年的追根、东西十万里的对比、大而化之的激扬文字吓傻；也许至今仍为受到的愚弄而感羞辱，为自身的愚昧而感羞愧，难于启齿；也许是怕抖开收敛起的思绪，弄得人仰马翻。柏林兄的日记给了我一个提醒，原来文革可以这样纪念！不必把一切都留给专家学者、不必等凡事有了公论、不必分析评判、不必断言结论，素描直书、有什么就拿出什么便好。甚或更好。

巧，正读日记的出版时，社区大学英语系的教授珍妮对我发出约请。她的外国文学课，讲到一位华人作者的《巴尔扎克和小裁缝》一书。书写两个南方知识青年在农村插队时读外国名著的故事。珍妮希望我去讲讲当时的背景。这一下，让我从未有过地把文革时期的、已被专家命名为的“地下读书运动”想了个前前后后。对照柏林兄的日记书单、查阅中外文学词典、翻出我当年读书的摘抄、居然找到一本为留纪念从中国带来的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竖版繁体、古色古香。那几日，我想起了辩论、串联“检查四旧”；想起了飞车、聚会、冲公安部；想起了从“小太阳”到“可教育好的子女”；想起了政治压力下郁闷的窒息。想起了溜门撬锁，钻进学校图书馆“借书”；想起了把禁书包个皮，写上“仅供批判用”；想起了呼啸的寒冬，在北方农屋油灯下裹被读《呼啸山庄》；也想起了拿了我《唐诗》的宋柏林，在军营里用南方的怪腔怪调背诵：“天藏（长）地久有丝（时）静（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我恍然大悟：当我欣赏《简爱》纯洁而又有尊严的爱时，无形中接受了爱的超“阶级”意识。当我为欧文（《九三年》）之死遗憾时，不禁对他跨越政治立场的怜悯之心打动。当前途渺茫，不得不为过冬取暖扑赴在地上收集落叶时，雨果的话：“每一次，不管他的腰弯得多么深，他的精神总是高扬的”，令我抬头还能欣赏落日红霞。当我回味这些经历时，深感苏俄小说中“大风想把歌声撕碎，却把它传得更远”的句子真够确切。很难说当年哪本书、哪个故事根本改变了我，也不能说我的成熟完全决定于这些书，却得说从一个角度，它们打开了我青年时代被加与的禁锢，受到了“革命文化”不能给予的深层的人性感化。它们唤醒了我的个性，拯救了我的灵魂。我成为今天的我。如实在课堂上讲了。一个学生写道：“……我将终身难忘。”

除开美人习惯把客气话说过头的水份，从他们的理解中，我至少断定，原来整理过去，可以一点一点开始，并不那么难。



姑且不论于国、于民、于社会，防范不可再的浩劫。我们一辈人，文革开始时十几岁，正是身心发育的异变时期。“脱胎换骨”的运动，打乱了青少年成长的常态，留下分孽的须根，明里暗里影响着我们的情感心智、为人处世、婚姻家庭、子女教育、生活模式，乃至梦境思幻。如今我们五、六十岁了，在《血色浪漫》中微醺片刻，却不会沉醉，《在梦开始的地方》驻足少时，却不会徘徊。那毕竟是些太表面的演绎，何况大家早已接受了“向前看”。不过，哪怕只为给自己和孩子们一个交代，不该审视审视半生前的经历吗？

感谢柏林兄的慷慨，拿出一本日记，提供了时间表、进程图，顺着那些线索，我好看来时路。

~~~~~

## 【往事回首】

### 《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节选一）

（1966年6月—7月）

• 宋柏林著 • 余汝信编注 •

1966年6月1日      星期三      晴

今天“六一”儿童节，我们几个到颐和园去划船游泳，好不愉快，不管怎么样，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966年6月2日      星期四      阴、雨

形势发展太快了，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吹响了向一切牛鬼蛇神，反毛泽东思想开战的号角，我们太高兴、太兴奋了。下午我们到了《解放军报》社，送了些稿，谈了些情况，晚上我们一直在“北大”看大字报，听声讨会，但清华和我校太不象话了，冷冷清清，负隅顽抗，我们要准备一场恶战！

注：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于5月25日下午2时许在北大大饭厅东墙上贴出的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6月1日，毛泽东令“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故此，这张大字报，新华社6月1日全文播发，《人民日报》等报刊6月2日全文刊载。《人民日报》今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称：“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这些话语，以后都成为各地（首先是青年学生）反本单位领导的有力依据。

1966年6月3日      星期五      阴、大风、雨

又到“北大”去看了一个上午，抄了好多大字报。真是，他们反扑聂元梓等人的许多作法，与我们学校如此相似，真是越看越有底。

中午我们“红卫士”的一部分战士到园明园去开会，正式建立起组织机构，订好了反攻计划。我们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大字报，在此同时要搞好“统战”工作，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最广泛的团结同学，向学校里的一切反毛泽东思想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听说“北大附中”起来革学校的命了，把校长老师都罢了官，学生当了权。我们下午特地

去支援他们，可惜工作队不让任何人进学校。

反攻的时候到了，一场恶战就要开始，敌人不会自动后退，我们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注：日记中出现“红卫士”这个词。其来龙去脉，详见骆小海序注3。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的日期一般认为是5月29日。根据本日记记载，其组织机构则于6月3日正式建立。

工作队，又称工作组。6月1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派出以张承先（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为首的工作组进入北大。北大附中的工作组，为北大工作组的组成部分。此后，刘、邓要求中央各部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到北京各大专院校，并要求团中央负责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由工作组代行学校党组织职权，以控制局面。

1966年6月4日 星期六 阴、起风

上午与爸爸谈了学校的事。爸爸很支持我们，并答应明天到我们学校去看看，并说：“有必要时，我也可以给你们贴一份大字报，支援你们嘛。”爸爸听说学校依靠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打击我们干部子弟，很气愤，说这就是对我们的专政，他们早把我们恨之入骨，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没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早把你们杀光了，这里面有阶级仇恨啊。爸爸的言谈之中爱憎十分分明，旗帜十分鲜明，坚决支持我们干革命，要我们好好读主席的书，好好锻炼一下自己。与爸爸谈过后，我更坚定了，浑身充满了力量，觉得更有靠山了。看了今天《人民日报》的社论，我们回去斗争时一定要旗帜鲜明，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然你用敌我矛盾来对待我们，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

晚上看电影《抓壮丁》，真是一株大毒草，对农民是极大歪曲，对地主极大美化、同情。

注：今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根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不指名地公开批判了《二月提纲》。《抓壮丁》，八一电影制片厂1963年根据吴雪、陈戈等人在抗战时期创作的同名四川方言话剧改编拍摄。4月26日始，《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批判该影片。

1966年6月5日 星期日 晴

上午爸爸和伍秘书、小陈一起来到我们学校，对我们的斗争是一个极大的支持。

王铭找了孔原，熊钢找了薄一波，还找了许多其他的老干部，凡是找到的老干部，都坚决支持我们干革命，其他许多学校的干部子弟，如“一〇一”、“四中”、“人大附中”、“航院附中”、“北大附中”等，都来我校，并写出大字报来支持我们闹革命，作我们的后盾。并说：有党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一定要与敌人拼死斗争到底。蒋南翔作了检讨，学校可能也要改变腔调，形势发展得太快了。

注：伍秘书，宋父的秘书，1963年随宋父由广州而海南而北京。小陈，宋父的警卫员。

孔原，时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调查部部长。

薄一波，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

熊钢，宋的高631班同学。父熊向晖，时任中国驻英代办处代办。熊父1967年1月奉召回国参加文革，1970年中央调查部与总参二部合并后，任二部副部长，1970年代初以周恩来助理名义参与基辛格、尼克松的访华会谈。文革中，历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驻墨西哥首任大使，中调部副部长。

蒋南翔，时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高等教育部部长，部党委书记，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今日在清华全校大会上讲话，指出：“保卫校党委”的口号是错误的，表示要“引火烧身”。6月13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在清华全校大会上代表新市委宣布蒋停职反省。

1966年6月6日 星期一 晴

各兄弟学校干部子弟纷纷来校声援，对我们的鼓舞和支持极大。  
但运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急需解决。

注：参见本书附录3 北京四中同学的大字报。

1966年6月7日 星期二 晴

第一天熬夜，早上4点就天亮了。我们把文化大革命中学校领导的作法摆了出去，十分鲜明，即：扮演资产阶级保皇党的角色，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依靠，打击工农革干子弟，对革命派实行专政。不是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是树立党支部的权威。现在不能太右倾了，而要左。

1966年6月8日 星期三 晴

学校使出最卑劣也是最愚蠢的手法，上午搞了个分裂大会，一些同学恶意煽动，企图分裂工农干部子女。外校2百来人从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多，把别人5、6个学校的同学关在外面，引起别人极大愤慨。最后大家开了一个声讨会，对清华附中校领导的这种恶劣手法提出最强烈抗议。在学校的煽动、造谣下，引起学校大部分同学（尤其是初中的）对“红卫兵”的敌对情绪。形势发展对“红卫兵”产生很大压力、不利。但却是一个大暴露，使各校同学都身受其害，这又是一个绝大的好事。搞吧，搞得越大越好。

7：00左右工作组来了！万岁。真快啊，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注：清华附中的工作组由团中央派出。自此，进入工作组领导运动时期。

同日，由北京新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负责人周赤萍（国务院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后任工作组副组长）到达清华大学。宣布：从现在起学校工作由工作组领导，明天工作组人员进校，学校党委停止工作。

1966年6月9日 星期四 晴

工作组的5位同志，还有海淀区文化革命小组的负责人，晚上讲了一篇非常非常好的话。以十九中的经验为名，实质上就是针对我校讲的。讲得革命的左派个个欢欣鼓舞，受蒙骗的同学猛然醒悟，而那些牛鬼蛇神个个胆战心惊，真是大快人心！

这又是一个大转折。又是我们高兴的时候，这时最最关键的是团结群众。如果没有把群众团结好，敌人的反扑就会是空前的；如果团结好群众，敌人就会很快瓦解。

1966年6月10日 星期五 晴

上午到团中央去听全海淀区的中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报告。

下午回校，形势已经大变，红卫兵的大字报到处都是。同学纷纷起来揭露，大骂校领导。广播站也夺过来了，真是大快人心。想前天晚上右派还猖狂空前，曾几何时，风向已经大变，专政已经颠倒了。造反精神万岁！

毛主席万岁！

注：日记中首先出现“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

文革中大行其道的“造反”、“造反有理”，缘自于6月9日《人民日报》第六版的一篇短评《汉弗莱的哀叹》所引用的毛泽东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此文一出，即被政治嗅觉敏锐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所发现，毛的“造反有理”被引为红卫兵手中的有力武器，后遂成为风靡全国的政治口号。

1966年6月11日 星期六 晴

8号晚工作组来后，学校的反扑达到最猖狂的顶点，谣言满天飞，对“红卫兵”实行围攻。但曾几何时，今天是我们斗争他们的时候了。

早上就在操场上几个老师来揭露学校，引起广大同学的极大愤怒。10点，在广大同学的一再要求下，我们高631在教室控诉、斗争了班主任丁淑慧。我主持，这真是对他们的专政。丁淑慧早上还在我们面前哭哭泣泣，想用眼泪迷惑我们，溜过去，办不到！在会上，叫她怎样做就得怎样做，让她站起来，就得老老实实在地站起来，让她低下头她就得低下头。让她说，让她住口，她都要服从。真是一付丑态。对敌人就不能仁慈，不能心软，对他们没有什么“民主、平等、博爱”，只有专政。阶级敌人心不死，革命远没成功，一定要更提高警惕，万不能松动，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1966年6月12日 星期日 晴

回来打听了几个学校，都派去了工作组，都闹翻了个。今天我才更理解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立场、感情。群众没起来，任你天大的本事也无济于事。群众一旦起来，真好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一切牛鬼蛇神都无藏身之地。只有被别人专政过，经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取得了胜利，重又掌握了政权，对敌人专政了，才真正感到对敌人专政，自己当家作主人是什么滋味。这两天真是扬眉吐气，趾高气扬，什么办公室、“党支部”、“校长室”统统打开，打个稀烂。什么“校长”、“主任”、“老师”一个个都得低下头来，唯命是从，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以前“打游击”时，斗争艰苦，人又少，那时倒没有什么私心杂念，只想一心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事业，革命到底，心旷神怡。现在“掌了政”，同学们都支持，加入红卫兵，反倒觉得事更多，更难办了。一些个人打算，如个人的一些名利等，也冒了头，这是非常危险的。主席早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就教导我们要继续保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告诉我们这只是开始，更伟大艰巨的事业还在后头。我一定要好好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踏踏实实，埋头苦干。我要努力做到：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做一个纯粹的人！

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于1927年3月，载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该文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等词句，是文革中引用率极高的“最高指示”。该文中提及“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如“清算”、“小质问”、“大示威”、“戴高帽子游乡”、“关进县监狱”、“驱逐”等在文革中被广泛应用，“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成为文革“红色恐怖”的合法依据。

1966年6月13日 星期一 晴

昨天我们几个都回家了，刘晋同志和许多外校来支援的同学都批评了我们。说我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我们完全接受这个意见，坚决改正。现在只是斗争的开始，以后的工作更艰巨，更细致，更复杂。我万不能有半点放松警惕，一定要以更大的革命热情，将革命进行到底。

今天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刘晋同志肯定了我们红卫兵就是革命的左派，就是要支持红卫兵。肯定了4点，听毛主席的话；敢革命；顶住了歪风，是无产阶级硬骨头；谦虚、团结广大师生一起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红卫兵，还做得很不够，不配这些荣誉和奖励，我一定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艰苦奋斗、将革命进行到底。

注：刘晋，中央团校干部，时为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负责人，并以此身份指导清华附中运动。

1966年6月14日 星期二 晴

全班再次统一，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但别以为这就达到目的了，胜利了，不，这是一幅重担子。全班53个人交给我们，能带好吗？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前容易的很，就几个人“打游击”，顶住黑风，然后把一切打个稀巴烂，这是很痛快的事。而现在可不同了，把学校打倒了并不等于把它消灭了，黑线的影响，修正主义的根子要彻底肃清、挖掉，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扎根到每个同学的脑子里，这是更艰巨、更复杂、更细致、更长期的任务。决不可有半点自满，故步自封。革命远没成功，如果现在就停止了步伐，那终会落后，跌跟头的。

1966年6月15日 星期三 晴

应以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为准则，严格要求自己。

航院附中的工作组实在可恶，是一群反革命，他们走的一条资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依靠地、富、反、坏、右、资等子弟，打击革干子弟，这纯粹是反革命。我们怒火填胸，愤怒地写了大字报，并当面找到工作组提出严厉质问，并提出最强烈抗议。

他们学校有些学生党员，也是革干子弟，但由于“马列主义”学得太多了，学到了“辩证法”，学会了全面看问题，但是却把最朴素的阶级感情，最基本的阶级立场给丢掉了。这样的人，就是修正主义的好苗子，我要严防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一定要在实际中学习毛泽东思想，把自己培养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注：北京航空学院附中工作组可能比较注意掌握政策，引致“革干子弟”的不满，“血统论”其时已露端倪。

1966年6月16日 星期四 晴

开了讨论会，很多同学发言积极，以后要负起责任，放手大胆工作。

1966年6月17日 星期五 阴

晚上开全校师生声讨大会，斗争校长万邦儒。这家伙真是顽固透顶了，硬是不承认自己所干的事。阶级敌人不打不死，不斗不倒，他们的阶级本性是不变的。

1966年6月18日 星期六 雨—晴

报纸和广播登出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取消高考制的通知。真是把我乐开了花，我真是太高兴了。这才是彻底革命的作法，这才能防修反修，这决不是上大学的问题，而是更好地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我一定要最坚决地服从党的分配，到哪去都是干革命，到哪去都能练出一身革命的硬功夫来。

注：据新华社17日电，中共中央、国务院6月13日发出通知，“为了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且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实际上这一推迟就是十一年，高考制度于1977年方正式恢复。

1966年6月19日 星期日 晴

看了主席真正的“七三”批示，十分感动。我们将亲手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将亲手埋葬帝国主义，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多么大！主席对革命事业的感情多么深！我是有志于革命，有志于接班的青年，我一定要一辈子艰苦奋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

重温《纪念白求恩》很有收获。与白求恩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相比较，自己相差太远了。这次文化大革命自己的思想怎样呢？开始自己也有些思想斗争，害怕犯错误，但是凭着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阶级立场，我自然地与广大干部子弟站在一起，相信他们的话，与他们的感情发生共鸣，后来在学校这个修正主义反面教员的教育下，我越来越坚定了自己的观点。我当时确实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即使我们的观点是错误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更何况我们得到那么多老干部、各校干部子弟的大力支持与鼓励。我的信心越来越足，心胸一直都很爽快。总之，在“打游击”、“地下”活动时期，自己没有什么个人杂念，也没有什么负担，我认为这段时期对自己的立场，感情是一个考验，说明自己还是可以的。但对自己的考验毕竟是太小了，我的最大弱点是怕苦怕难，而这一点几乎没有得到什么考验。也没有很大胆地起来面对面的斗争。甚至有些逃避心理，这方面还要很多地锻炼自己。后来翻身了，“掌权执政”了，情况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首先，个人的名利思想抬头了。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想到将来改选，应该到上面搞领导的工作了，所以总想向上跑，不安心平凡的基础的工作。这是大事做不了，小事不肯做，这样的人对革命一点好处都没有。另外班里的工作多了，细致复杂了，更艰巨了，自己就有些畏难情绪，很不负责任。这几天自己为革命做的工作太少了，而夸夸其谈太多了。这是很危险的个人主义思想苗子。我要真真正正按照“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来改造自己，来干好每一件平凡的小事。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纯粹的人。

从现在起，我们见困难就上，为革命多做一点工作。要自觉地学习毛著，好好改造锻炼自己。

注：当时广泛流传毛泽东的“七三”批示还有以下一段话：“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多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的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这一段“豪言壮语”，后证实为伪托之作。

1966年6月20日 星期一 晴

学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颇有感想。对待两种人有两种办法。一，对待死心塌地的反动派，要坚决与它斗争，强迫它放下屠刀，才有改造它“成佛”的可能。即：先打后教。而对待一般动摇分子，虽则知道他们将会很永远地动摇下去，但还是应该善意地说服，团结、改造他们的，因为这对孤立敌人，对革命事业有利。晚上第三次斗争万邦儒的大会，这次把韩家鳌也拉了上去。这两个家伙真是阴沟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真把我们气死了。最后北京新市委文化革命委员会驻海淀区领导小组决定把万邦儒停职反省。这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喜事，当即给了万狗一猛棒，气焰顿时一落千丈，脸色刷白，站都站不住了。而广大革命师生欢欣鼓舞，斗志倍增。就是要这样，处处长革命人民志气，灭阶级敌人威风。

注：韩家鳌，时为清华附中副校长。

1966年6月21日 星期二 晴

主席规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5个条件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对照我来说，相差太远了，尤其是头两条，这是根本。无论做什么工作，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是我们的本职、本分。我只有尽力地去完成这份任务，而没有权力向人民、向革命、向党索取其他任何东西。

总结前阶段的斗争情况，说明：阶级敌人是本性不改，死顽固的，他们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是不打不倒的。但他们又都是顽而不固，只要我们发动群众，狠狠地打，彻底地打，他终会变成纸老虎，是不堪一击的。我们一定能把他们打倒、打臭、打垮的。

下午开全校师生代表大会，选举了由21人组成的革命师生委员会，我也当选了。我早已做好准备，只要是为革命，做什么工作都可以。重担子要抢著挑。

晚上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布了革命师生委员会的名单，真是举校欢腾。大家游行，呼口号，又跳舞，搞到十一点。但也看到这几家欢乐，几家愁。特别在我们学校，起码有50%是发自内心的恨的。与这样的人怎能搞好团结呢？

注：革命师生委员会，由校工作组主持成立，宋为成员。

1966年6月22日 星期三 雷雨

林彪同志3月11日就工交战线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写的一封信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最大最好的概括。他指出：要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样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思想不会自发地产生，而要通过活学活用毛著，把它灌输到头脑中去，改变人民的精神面貌，然后才能化为巨大物质力量。

以前，我总为与同学合不来，团结不好而苦恼。现在，我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是值得庆幸的好事。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改变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们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而现在的学校，则是资、小资的汪洋大海。如果在这样的大海里感到很合口味，很自在，那就糟糕了，那就证明自己的思想是很深的资、小资的了。反之，觉得不自在，不合口味，那倒证明自己的思想感情还没那么深的资和小资的东西。以前自己把总爱与工农、干部子弟在一些看成坏事，闹小圈子。其实，工农革命干部才是最大的“圈子”，是占人口90%以上的人们。和他们在一起是最能团结大多数人的。不过在我们这样的资产阶级学校里，是资、小资占70%以上，所以好象是不能团结大多数的人。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黑线造成的恶状，自己过去受到蒙蔽，今后要更坚定地与工农革干以及他们的子女站在一起。

1966年6月23日 星期四 阴

爸爸特地打电话叫我回家谈谈。

回家与爸爸谈了许久，爸爸说：在你们这样的学校里，团结95%可能不太适当吧。并说那些右派学生如果捣乱，就应敲打。但还是要注意，主要是夺权，是打当权派。对右派学生，你们心里都有底，一个成分，一个文化革命中的表现，就足以卡住他们，不让他们升学，让他们好好地改造。并说在学校里这些人是改造不了的。

1966年6月24日 星期五 阴、雨

昨天《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真是一篇很坏的文章。从内容上看，1、取消阶级内容，抹杀阶级观点，搞阶级调和。2、取消斗争，搞折中主义。3、不从实际出发，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学校，资产阶级势力占绝对优势的学校，能团结95%吗？另外从发表的时间来看，也是错误的，现在大部分学校都在和稀泥，左、中、右不分，投机分子、右派向左派反攻倒算。在这个时候，主要任务是组织阶级队伍，是斗争，只有斗争才有团结。而现在大讲团结，正是帮助敌人反攻倒算，投机、蒙混过关。所以这是一个有严重错误的文章。从实际效果来看，右派一个个喜笑颜开，有些已经开始反攻倒算，翻案等，十分嚣张。而左派却十分气愤。工作组是肯定这篇文章的，看来我们又面临著一场恶斗。

今天的《人民日报》社论《党的阳光照亮了文化革命的大道》这是一篇好文章，是给《中国青年报》的当头一棒。

1966年6月25日 星期六 阴

今晚真是痛快，与几百个大学生针锋相对的大斗了一场。

晚饭后我到大学看大字报，大学里以蒯大富为首的一批人反对工作队，这里大学的风向已压到了蒯大富。近十一点时，大礼堂前忽然聚了一大堆人，约5、6百人。原来是附中的一些

高一的把红卫兵的《作无产阶级的孙猴子》和《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贴出来了。后来就把一个高一的男同学给围住了。我看不好，想：“以前还没受过围攻，今天机会难得。再说应挺身而出给同志解围。”于是我就闯进圈里，果然，把我也围了起来。周围在狂喊，漫骂，有人喊道：“让他们站到桌子上来！”“站就站！”我就先让那个同学站上去，说了几句，不太来劲，我就自己上去了。我先说：“我是红卫兵的，但大字报不是我贴的，我看到你们一大群人围攻一个人，认为这样完全不能讨论问题，所以进来想让他走。你们不让走，那可以。文章上的观点我完全同意，你们提出的问题我可以解释。但我不了解大学的情况，有关大学的问题我拒绝回答。”于是各种问题就喊了出来。“你们为什么要‘混战一场’，这是右派提的，你们是什么目的？”“为什么越乱越好？”我说：“文化大革命要打破一切旧东西，就要把一切打乱，要混战一场，打他个稀巴烂，越乱越好，才能划清阶级队伍。”又有人喊：“你们造谁的反？”我说：“我们造资产阶级的反！”“你们支持蒯大富还是支持工作组？”“什么是造反？”“造反就是革命，革命就是造反！”“毛主席在哪里说过造反，你们对毛泽东思想歪曲！”“你们才是歪曲！”甚至有人拿出语录来问：“你找出来，哪里说了马列主义就是造反？”我不觉十分可笑，“你们硬要咬文嚼字，我们没有什么可争论的！”“造反是有阶级性的，你们造谁的反？”“大字报写得清清楚楚，你们不要断章取义，无理取闹！”“无产阶级造反革谁的命？”“资产阶级的命！”“资产阶级造反革谁的命？”“无产阶级的命！”“好！你说资产阶级造反也是革命！”真是一群无赖，甚至有人问得可笑：“现在你们附中谁当权？”“工作组！”“还要造反吗？”“还要造反！”“你们要造反一辈子？”“我们就要造反一辈子！”吓得那人半天说不出话来。然后就跟你胡搅蛮缠，乱抠字眼。有人推的，有人指的，都被我一严词驳回，再也没人敢动手了。有人叫道：“你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无产阶级立场上！”“你放毒！”“你点火！”我说：“这样围攻，没法争论下去。”“不行，原则问题一定要争论清楚。”“不能让他们溜掉！”我说：“你们找一个负责人来。”“我们都是负责人。”真是无赖到极点。有人又喊：“你们还要不要领导？”“要！”“谁？”“共产党！”“好！他打自己的嘴吧。你们要领导，为什么还要越乱越好？”“只有彻底打乱了旧秩序，才能建立起革命的新秩序，才能更好地加强党的领导！”于是各种叫骂声又上来了：“你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反革命！”等等，其实下面有很多人已经不满了，也有人说：“别人说的很清楚了么。”他们完全不从整个观点上看，而抠你的个别字眼，好让你跳出人民内部争论的圈子。甚至有人无理到这种地步，硬说：“你是红卫兵的，你一定知道贴大字报的目的，你说！是什么目的？”这种不值一驳的挑衅，马上被下面一些正义的同学顶回去了。最后看着不可开交，就有一个人站起来喊道：“他已经被我们驳得体无完肤了，你讲不出道理了。”我在一边笑着说：“确实，在这里我有理由也讲不清了。”他接着喊道：“让他留下单位，姓名，放他们回去吧！”“完全可以！拿纸和笔来！”马上有人送来了纸和笔。我大笔一挥，那人接过来大声念道：“高631，宋柏林，宋一柏——林！听清了没有？”“听清了！”然后就分出一条通道来，让我们出去。这时有些人乘机推我，我一手打开了，“推什么！”再也没人敢推了。有人不服气地骂道：“他妈的，还要保卫他们！”我露出了得意的微笑。出去后，好心的大学生们让我赶快离开这里。今天晚上是最幸福的一天。我理直气壮，针锋相对，面对着几百个大学生的叫骂，我自归然不动，干革命就要有这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我现在才发觉：围攻并不可怕，反而十分幸福。在一场围攻中，我是高姿态，一直以胜利者自居。

注：日记中首次出现后来闻名于世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该文详见附录1。

蒯大富，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化902班学生。6月16日，蒯等二人贴出清华第一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往哪里去？》，6月19日，蒯与到清华看大字报的薄一波激辩四十分钟。6月24日始，工作组在全校开展反蒯斗争，但支持、同情蒯大富者也大有人在。7月29日，毛泽东要周恩来“过问”清华文革运动，同日，工作组撤出清华。8月4日，周恩来宣布“清华园新生了”，蒯获平反。蒯后为北京大专院校文革“五大领袖”之一。

关于本日事件及红卫兵与蒯的关系，参见骆小海序。

1966年6月26日 星期日 晴



接到广州的来信，他们那斗得也非常激烈，蔡小彦、李重明等成为了“聂元梓”，真不愧为革命后代。我给他们回了信，希望他们能永远保持并发扬革命的造反精神。

注：蔡小彦（应为蔡晓彦）、李重明，宋在广州华师附中时的同学。蔡父蔡炳臣，1955年授少将军衔。1965年11月由广东省公安总队第二政委调任湖北省公安总队政委，1966年8月，该总队改编为湖北省军区独立师（代号8201部队），仍任政委。李父李立，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长，1964年11月调任改组后的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贵州省省长。蔡、李未随父到外地，留广州续读。5月27日，李重明贴出华师附中第一张大字报。蔡、李均为当时华师附中反工作组的“十一人事件”主角。

1966年6月27日 星期一 阴

“李家庄学习毛著经验交流展览”的讲解员们敲锣打鼓地来到我校声援我们，并与我们座谈。我们要准备迎接更艰苦的工作。

要加强政策观点，以前是“忠于革命”、“敢于革命”，现在要“善于革命”。

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是八句话“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1966年6月28日 星期二 雨

今天爸爸到北大参观大字报，顺便来看看我。我谈了学校的情况。我们红卫兵与工作组是唇齿相依，要密切合作，革委会要在工作组的直接领导下来进行工作。万不能“游击”气太浓，反劲太足，目中无人。要树立党的绝对领导，要加强政策观点。但无论如何，最基本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旺盛的革命造反精神万不能丢。

1966年6月29日 星期三 阴

主席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这几天个人考虑有一些，工作很浮，没有踏踏实实地扎到基层中，群众中做一些工作。个人有什么得失呢？老一辈头都不要了。将来，主席对我们抱有多大的希望啊！要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踏踏实实地锻炼，为党作好一些工作。

1966年6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采野菜，虽不多，但也很累了。起码的收获：1、体会到了采野菜的艰苦性，走了很久才采了一点，我说：“这是由于我们没采过野菜。”另一个同学说：“不对，是因为我们肚子不饿。”2、认识了许多野菜。

1966年7月1日 星期五

庆祝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四十五周年生日，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下午开了第一线10人的民主生活会。

晚上7人到“北大附中”参加庆祝“七一”大会。邀请上提出苛刻要求，一律是干部子弟，而且尽量穿黄军装。大会充满“红色恐怖”，台上都是黄军装。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志愿军等战歌，自编的“造反歌”响彻云霄。真是大长工农干部子弟志气，大灭剥削阶级子弟的威风。但北大附中的情况并不好，左、中、右分的不清，左派没经过艰苦的考验，右派也没充分暴露。

注：第一线10人，指清华附中红卫兵核心成员。

“造反歌”为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所作，歌词为：拿起笔 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革命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主席思想放光芒。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杀！杀！杀！——嘿！

1966年7月2日 星期六  
分别召开了二线10人，三线24人的民主会。

1966年7月3日 星期日  
与张小宾、邝桃生和高656的干部工农子弟到八宝山烈士公墓扫墓。在烈士墓前宣了誓，要永远造反，永远作党中央和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卫兵。

注：邝桃生，预651班学生，清华附中红卫兵核心成员。

1966年7月4日 星期一  
昨天我国政府发表庄严声明，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今天上午全校开了声讨会。  
晚上与老常座谈。老常同志明天要回去，今天特地到我们班，加上高三其他三个班的部分同学，一百多，谈了四清运动中的问题，对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等问题都作了很好的生动的论述故事。

注：老常，工作组成员。

1966年7月5日 星期二  
晚上参观“李家庄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  
回来后又参加了斗争顾涵芬的大会。后来谈到了阶级路线，真是群情激奋，许多工农干部子弟气得咬牙切齿，流出了眼泪，特别是那些过去受了骗的，更加痛哭流泣。真是事事离不开阶级路线，阶级路线一触即发。只有大讲特讲事事讲永远讲阶级路线，才能迅速提高工农革干子弟的阶级觉悟，激发阶级感情，才能使工农革干子弟扬眉吐气，迅速组成阶级队伍，保证革命工作飞速向前。同时也才能使那些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同学迅速靠拢左派，才能最有效、最广泛、最牢固、最迅速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参加革命运动。

注：顾涵芬，女，清华附中分团委书记。

1966年7月6日 星期三  
晚上与韩军、阎阳生一起赶到《中学生杂志社》去帮助张小宾、骆小海写文章。

注：韩军，阎阳生，预652班学生，骆小海，预651班学生，均为清华附中红卫兵核心成员。该文参见附录4。

1966年7月7日 星期四  
通宵我只睡了2小时，其他人也只睡了不到4小时，真是艰苦奋斗，把我们的心血都灌进文章中，就是为了把我们红卫兵的革命气概，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写出来。为全市革命的红卫兵撑腰、出气。

下午到张小宾家，他妈妈和我们谈了许久，让我们好好学习主席著作，好好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切不可头脑发热被敌人利用。

1966年7月8日 星期五  
今日得空余，与几个同学一起到运河泳游。  
晚上几个人碰头开会，谈到当前形势，感到比较复杂、紧张。外面对我们谣言很多，工作组对我们控制很严、很警惕，为什么？

1966年7月9日 星期六

上午与韩、刘、白、杨等5人到“石油附中”，分别到“赤X”、“红卫兵”、大学生处了解了情况。看来“红卫兵”与“赤X”的矛盾只是表面的，实质上是附中工作组与大学工作队的矛盾。而其后台又是团中央（或中央团校）与石油部。事关重大，切不可轻举妄动。准备迎接一场新的更复杂的战役吧。

注：韩、刘、白、杨、即韩军、刘沛、白若丽（女）、杨小燕（女），刘为高651班学生，白、杨为预652班学生，时均为红卫兵骨干。

1966年7月10日 星期日

与爸爸、妈妈谈了一个上午，他们说：没有调查当然不能乱支援，工作组也不是很纯，个别人可能也会有问题，但不能全否认了。你们要准备材料，准备以后出事了用，防备翻案。切不可与工作组唱对台戏，有问题在内部摊开了讲。阶级路线当然要大讲，这就是毛泽东思想。“造反精神”要解释透，多引用主席的话，千条万条，不学主席思想一条也没有。要谦虚些，不要以领导者自居，也要听别人的话，不要自以为是。

晚上学校请来保定四清工作团的幻灯放映队来演出。真是好极了，这才是革命化的，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文化轻骑兵。

1966年7月11日 星期一 阴

据体院（国家体委），阎的父亲都说大会中提到我们红卫兵反对工作组。而据一〇一、矿院附中、三十五中等反映“工作通讯”十七期中大部分都是说我校红卫兵的。说我们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因为针对工作组、团中央写了大字报等。还说我们开秘密会，钉梢工作组组员等。这些谣言都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外校有些工作组组员还公然说我们是假左派，真右派。这还了得！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在没有确凿材料时，还应信任、依靠、服从之。但也不能忘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还要保持应有的警惕，凡事多用脑子想想，多用毛泽东思想量一量，三思而后行。

注：阎阳生的父亲是军事科学院的干部，时为驻中央戏剧学院工作组组长。

1966年7月12日 星期二 雨

又到运河去游泳，锻炼勇敢精神。

学习《二十三条》等党的政策，使自己提高到党的政策的水平上，为党作更多工作。

我不感到自己在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只觉得是在“作威作福”地干革命。

1966年7月13日 星期三 晴

从下午开始到“圆明园农场”的稻田中拔草。这些活在广州时都干过，但到这来以后就一直没摸了。劳动，从心里我是不大乐意的。这次劳动更显出自己的弱点——怕艰苦。毛主席说：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青年的最后分界就是看其能否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能吃苦、能劳动。我有志于成为一个革命青年，就一定要过“劳动关”。

1966年7月14日 星期四 晴

烈日把我的皮肤晒得通红，劳动并不象自己想象的那样“可怕”。你不怕它，下决心好好地接近它，你很快就能熟悉它，与它交上朋友。劳动，吃苦也是可以练出来的。

昨晚至今晨，革委会开了民主生活会，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得很好。我也检查了自己的个人主义，不以革命利益为自己生活中处处的最高准则，而是对革命工作、对革命同志不负责任，怕担重担，不愿负责任。这就是缺乏“完全”、“彻底”，缺乏两个“极端”，这样是

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不能革命到底，革命一辈子的。

1966年7月15日 星期五 阴、雨

昨晚到今晨，革委会又是会议，刘晋回来召开的。种种迹象表明，不会太远的时间里，即会“天翻地覆慨而慷”。我们更是“早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了。今上午劳动最后结束。

文化革命的事实，永远告诉我一个道理，“一天等于20年。”在“快”字上，我永远是落后的。上一段日记笔迹未干，翻案的枪声已经打响。下午一个报告会，是给翻案制造舆论准备。然后，突然袭击，根本没有征求我们的一点意见，就改选了分团委，书记、副书记都由工作组独揽。9个委员中只有张、高是坚定的红卫兵。我原已估计到要利用改选分团委来削弱红卫兵的力量，但没想到这么干脆利落，一下子就几乎削没了。作完报告已近6点了，却要求7—8点改选支部。真是急、真是紧。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形势变化急聚，我们马上认定革委会，核心小组已不是实力机关，将慢慢被挤掉，所以只有把主力放到支部中，组成坚固堡垒，以便斗争。

注：张、高、即张晓宾、高洪旭（预652班学生），清华附中红卫兵核心成员。

1966年7月16日 星期六

瞬息万变，9点多又开了大会，宣布我校有208个名额下连当兵三星期。

208个，三星期，这是个。

作任何事情都要准备两手，现在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我们对任何事物都不可抱有幻想，决不能存在侥幸心理，靠意外便利取胜。这样只有永远被动，永远失败。正确的态度，是后发制人，因势利导，在问题决定前，要力争主动，积极创造条件，问题决定以后，就要根据现有的条件，进行艰苦的工作，使形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化。

1966年7月17日 星期日 阴、闷热

昨晚又开革委会，忽然点名让我去下连。后经我们的争取，又没去成。我估计这是一个试探。

回到家里，与爸爸谈起学校的事，爸爸说他们经过调查，证明石油学院工作队是正确的，党委是革命的。工作组让我们去支持被我们拒绝了，这是很正确的，是符合中央精神的。爸爸很支持我们干革命，说这是长期的斗争。爸爸要求我们注意学毛著，按党的政策办事，打击面不要过大。

看了许多参考资料，看出目前世界上也正处在更彻底的分化，改组之中。日本党也可能分化了。我们处于这个伟大的革命时代，我们之中的分化，改组也是必然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1966年7月18日 星期一 闷热

张田丰又是大暴露，形势突变，看来革命风暴，更巨大的就要来临，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注：张田丰，宋以此隐语指代工作组，张指工作组组长章建华，田、丰指工作组成员小田、小封。

1966年7月19日 星期二 晴

昨晚又开交心会，我们有理、有利、有节，我们掌握毛泽东思想，我们是真理，而真理是不可战胜的。张田丰的态度很恶劣，绷着脸，很心虚，又不虚心。昨天齐向东的大字报轰动全校，广播时小叶气急败坏地闯进来，撕了稿件，这种态度是对待同志的吗？

红卫兵上午开大会，刘讲话，说：“谁要是说红卫兵是假左派，我坚决不答应！”好爽快，

真是难得啊！

注：齐向东，高631班红卫兵小组的笔名，其大字报详见附录5。小叶，工作组成员。刘，即刘晋。

1966年7月20日 星期三 晴

下午授枪大会和动员参加22号北京市援越抗美大会的大会一起召开。授枪仪式非常庄严感人，每个人接枪前要在主席像前宣誓：“永远忠于毛主席”。

参加声援大会，我负责组织，要敢于担重担，又能很好的锻炼自己。

开斗争郑国行贼的会，张田丰又暴露的十分明显，打到郑身上，痛在张心上。他有一点阶级感情吗？无动于衷，甚至是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身上，记下我们的言行。可恨！

注：郑国行，当时被工作组和红卫兵认定为反动学生，贼为红卫兵对其诬称。

1966年7月21日 星期四 晴

明天到天安门去参加北京市百万人大会，我担起主要工作，忙得几乎不可开交，毛选也没学好。

1966年7月22日 星期五 晴

参加北京市百万人援越抗美支援大会和游行示威。刘主席发表了声明：中国人民准备最大的民族牺牲，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后盾，中国广阔的国土是越南的大后方。我们一定要学好毛著，炼好本领，准备随时为战争服务。

目前似乎进入了相持阶段，都在“策划于暗室，点火于基层”，积极积蓄力量，准备决战。

1966年7月23日 星期六 晴

上午，留校红卫兵骨干几乎都到八宝山烈士公墓去参加刘瑜（刘泽鹏父亲）同志的追悼大会。在烈士灵前，我们激动地宣誓：“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我想：我们现在与张田丰过不去，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为了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阶级路线是试金石，依靠谁，打击谁就是政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容不得半点含糊，掺不得一点假。在这面照妖镜下，一切牛鬼蛇神都将原形毕露。

从中午12点到晚上12点，7人挖黑线，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我谈了自己的为人，最近的名利思想，不负责任，怕挑重担等思想。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老三篇”，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

注：刘泽鹏，应为刘泽彭，1965年考入清华大学的原清华附中学生，干部子弟，与附中学生来往密切。

1966年7月24日 星期日 晴、雨

晚上到张小宾家，他妈妈跟我们谈了很久。刘晋等又找他妈妈谈了。看来工作组很被动，很头痛，他们也承认失去了我们的信任。似乎很痛苦，我们以后应怎样处理和工作组的关系呢？

工作组是由党派来的代表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一直是坚信不移的。即使工作上有一些意见分歧，我们也是抱着信任他们、依靠他们的态度来解决。但是，他们后来的种种言行却使我们感到很痛心，很气愤，很失望。简报的事，石油附中的事，团委改选（作法、人选）的事，分裂预652的事，高632反革命小集团（王加强等）的事，预642景小东的大字报的事，征兵的事（高631人选），阶级感情（叶说反革命，叶撕大字报，刘、叶对征兵的阶级路线小条，斗争郑国行的会），高632阶级路线，归根结底是一个阶级路线问题，一个阶级感情问题。

尽管问题比较多，但是几次交心会，我们也把心交出了。可工作组一言不发，态度极其恶劣。他们的作法，完全失去了我们的信任。我们有阶级立场，阶级感情，我们还有阶级警惕和嗅觉，面对着这些事实，不能不有所怀疑。这是完全正确的，是最符合党的利益的，是无可非议的。

现在工作组表示了态度，愿意搞好团结，这很好，那就看行动吧。如果以为表示一下态度就把一切都解决了，就能把过去的事不了了之，那是绝对办不到的。那就是最大的党性不纯，那就是对革命，对党的利益的不负责任，是失职。我们的态度。首先，在外面服从工作组的领导，但如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坚决抵制，反对。其次，我们要有阶级斗争观点，过去的怀疑没解决之前，我们还要对党负责，对革命负责。

1966年7月25日 星期一 阴

到“工人体育馆”开了一天的“北京市中学师生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

我是没有很认真听，因为我感到经验交流的主要内容都是“团结”、“政策”、“教师”、“受骗”等，很少阶级分析和出身成分。尽以“班”为界限，老师、同学为界限。我认为这里有极大的错误，起码是极大的不足。

我发现：阶级分析一用就灵，出问题就出在这上面了。

1966年7月26日 星期二 晴

晚上到北大，正碰上开大会，这真是大革命的风暴。江青、陈伯达、康生、李雪峰、王任重、曹荻秋、刘志坚、姚文元、戚本禹、关锋等都去了。江青亲自主持会议，辩论会十分激烈。最后江青、陈伯达、康生、李雪峰、刘志坚等都说了话，定了调。罢张承先的官，撤走工作组。并推而广之，派工作组的作法已经完全不适用了，要破除迷信，破除旧习惯势力。撤消一切工作组，由师生自己教育，管理自己，自己革命，一切权力归革委会。等等振奋人心的消息，我真想跳起来了！一个多月来的话都要放出来了。革命的大风暴已经降临，让它来得更猛烈些吧！

注：7月18日，自1965年11月后在南方大半年的毛泽东回到北京。次日，毛即严厉批评称：派工作组是错误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7月22日至26日，毛指令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四次到北京大学，以座谈会、辩论会等形式了解北大文革情况。

据江青当晚讲话称，文革小组成员都来了，除江自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外，包括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姚文元，穆欣、戚本禹、郑季翘，“还有三个组员没有来，他们有工作。”参加辩论会的，还有李雪峰（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曹荻秋（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曹7月25日在北大讲话称，他是“代表上海市委的同志来看你们的大字报，学习北大文化革命的经验”。陈伯达在当晚的讲话中称：“我们的第一个建议是：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第二个建议是：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革委员会，在全校成立文化革命总委员会，或者叫文化革命代表会议”。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